



时代书局

PEOPLES  
AND EMPIRES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西方帝国简史  
欧洲人的文明之旅

〔英〕安东尼·帕戈登○著

徐鹏博○译

013044338

K109  
173

# 西方帝国简史 欧洲人的文明之旅

P E O P L E S  
A N D E M P I R E S  
F R O M  
A N T I Q U I T Y  
T O T H E P R E S E N T

[英]安东尼·帕戈登〇著

徐鹏博〇译



k109  
173



北航 C1652296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方帝国简史 / (英) 帕戈登 (Anthony, P.) 著; 徐鹏博译 . --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212-05923-1

I . ①西… II . ①帕… ②徐… III . ①世界史—通俗读物 IV . ① K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80866 号

安徽省版权著作权合同登记 字: 12121139

PEOPLES AND EMPIRES

Copyright©2001, Anthony Pagde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eidenfeld & Nicols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译文由左岸文化出版社授权)

## 西方帝国简史

作 者 | [英] 安东尼·帕戈登 (Anthony, P.)

译 者 | 徐鹏博

出 版 人 | 胡正义

出版策划 | 陈丽杰

出版统筹 | 陈丽杰 李 争

责任编辑 | 杨迎会 李凤琴

营销推广 | 徐江宁

责任印制 | 刘 银 范玉洁

装帧设计 | 段文辉 陈喜艳

出 版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人民出版社 <http://www.ahpeople.com>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8 楼

邮编: 230071

发 行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120 010-64267397

印 刷 | 北京卡乐富印刷有限公司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787×1092 1/16

印 张 | 14

字 数 | 180 千字

版 次 |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212-05923-1

定 价 | 36.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序

这是一本很简短的书，但主题却很庞大——大到可以直接称呼为世界历史。这是许多民族转变为庞大国家组织，即所谓“帝国”的故事。我们有意定义该词——尽管如此，充其量也只是模糊的定义——非洲、亚洲、美洲、欧洲都一直存在帝国。然而，我主要关注的是今天所说的西方世界的帝国，从亚历山大大帝的崛起一直到苏联的瓦解。我只在与西方帝国故事有关之处，才讨论到中国、毗迦耶那迦罗王朝、伊朗的萨非王朝。这并不是因为我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认为中国人、印度人与伊朗人绝对缺乏创造力、想象力和个体性；一般认为欧洲人因为拥有这三种特性，而能统治世界大部分的领土。这仅仅是因为这些地区有自身的历史，有时这些历史是向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的，而这部分需要其他专著来详述。

就像所有试图涵盖许多地域并横跨数段历史的书籍一样，写本书时我必须依赖同事与朋友的帮助，为我提供信息与建议。罗威（Bill Rowe）与罗勒（Matthew Roller）很有耐心地分别回答了我关于中国与罗马世界的问题。我从苏伯拉罕雅（Sanjay Subrahmanyam）与古伦辛斯基（Serge Grunzinski）学到如何以世界性的眼光去思考，还有关于印度、伊朗、拉丁美洲等地的国别史。我尤其要感激我课堂上的学生。我在华盛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高等国际研究学院（School for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开设“帝国与帝国主义”，那些学生提供我许多信息，质疑我许多模棱两可的主张，这种有着多种语言的国际性课堂中，教会了我很多曾坐立不安的东西。这本书的初稿得到蒙第（Toby Mundy）与摩尔斯（Scott Moyers）的仔细阅读，他们的评论对本书定稿的帮助难以估量。我很感谢他们的耐心与敏锐。我同样感谢威尔森（Rebecca Wilson）与杭特（Alice Hunt）在最后阶段的帮助。

西萨（Giulia Sissa）教导我古希腊文，还有关于人生的一切，我以感激的心将此书献给她。

巴黎 2000 年 8 月

## 引　言

阿根廷作家乔治·路易斯·博尔赫斯在《战士与俘虏的故事》一书中，讲述了两个故事。在第一个故事里，讲述的是一个叫狄罗克图夫特的伦巴第“野蛮人”，抵达拉温那的拜占庭人的城门，那里正是君士坦丁大帝的帝国行将崩溃的最后前哨。狄罗克图夫特以征服者的姿态抵达拉温那。他原本没有掌握更多的改变人生的方式，直到那一刻，他挂念的一直就是战争和伴随而来的战利品。他的人生是生活在一个迁徙的世界，一个马匹与帐篷、游牧与战斗的世界。他对城市一无所知，对科技或艺术，甚或时间的长短，也没有任何概念。他的世界就在他的部落里。就像博尔赫斯说的，他忠于酋长与部落，“而不忠于全世界”。陆地对他来说也漫无涯际，只因为他对疆界茫然无知。他征战的对象说着他听不懂的语言，他也搞不清楚对方的生活方式。但他逐渐意识到，这些住在城市里的“其他人”有着他所需要的好处，但他的部落却无法为自己创造。

当狄罗克图夫特进入拉温那的那一天，他仿佛变了一个人，一个与过去迥异的陌生人。他意识到了过去从不知晓的欲求，他被这个伟大城市的宫殿和广场、穹顶与圆顶等奇观给吸引住了。他原本是来掠夺的，但在被这一切震慑之后，此刻他认识到，除了转移效忠对象之外他别无选择，他要为保存曾经只想摧毁的一切而战斗。于是，他获得了从未想象过的东西；一块土地。在城市里，他一直都是一个局外人，一个“野蛮人”。也正是



▲ 图 1

罗马人的引水系统相当发达。位于法国尼姆附近的加德桥是至今仍保存完好的罗马引水渠建筑之一。人们推测它的修建时间大约在公元 20—40 年之间。加德桥结构坚固、巧妙，充分显示了罗马建筑师和水利工程师在技术和艺术上的卓越成就。

因为这样，他被原来的部族放逐，如博尔赫斯所说，此时的他还不如一个小孩或一条狗。然而，狄罗克图夫特与他的子孙就此展开了一段漫长的旅程，踏入欧洲人数世纪以来称为“文明”的世界中。

狄罗克图夫特走出了一条路。博尔赫斯的第二个故事则关于另一条路。博尔赫斯的英国籍祖母年轻时就被丈夫带往南美的彭巴草原，这是一片看似一望无尽的牧地，查尔斯·达尔文曾凝视着这片草原说，带给他“视野上的晕眩”。这位祖母在那里遇见一位来自约克夏的英国女士，这位女士幼年时在一次掠劫中被印第安人抓走，被当做印第安人抚养，后来嫁给一位酋长，为他生下两个小孩。博尔赫斯的祖母对瞥见“故事背后”的景象

而感到震惊，“宴席上满是烧焦的肉与生的内脏……一夫多妻制、恶臭、迷信”，她怂恿那位女士离开那里，回到她曾经熟悉的世界。但是，“这位女士回答说她过得很快乐，而且当晚就返回荒野了”。

\* \* \*

狄罗克图夫特与那位印第安人的俘虏有着反向的人生轨迹。本书谈的便是这两个故事所蕴含的意味，两人的相遇、相识以及偶尔的彼此困惑等几点。它还谈到了推动人类相互接触与冲突的因素，谈到各种不安定因素。也无可避免会谈到残酷与愤怒、冷漠与权力，谈到损失与时间的流逝。还谈到帝国，创造帝国的民族以及被帝国所塑造的民族。

无论我们如何定义“帝国”，或无论它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出现，帝国都一直是将威仪天下的稳定性置于彼此缺乏仁爱的群体之上的一种方式。大部分的帝国会给他们臣民提供一种机会与限制并存的混合体。很多人会选择接受机会而尽量忍受限制；但例外也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如此，大家都知道，像罗马这样的一个帝国所展现的版图与力量，即使它的光环已经逐渐消退，仍然有着狄罗克图夫特在拉温那看到的景象。它拥有累积的财富，高度科层化、技术化的先进社会带来的舒适——至少对可以负担的人而言。在博尔赫斯的故事描述中，它看起来似乎最有可能就是慑服狄罗克图夫特献身保护的对象——它就是创造力淋漓尽致的展现：绘画、建筑与居民服饰。尽管直到教会统治的8世纪，它已然成为历史陈迹，但至少从外部威胁来看，它也有着为平静与沉思的人生提供安全的可能性。

相较而言，博尔赫斯的祖母从年轻的英国俘虏的生活中所看到的景象，是由一个不断迁移的生活、一个居住在旷野的生活，一个没有程式或终极目标的生活等画面拼接而成的。对她，乃至对所有欧洲人而言，一个完整的“人”

该有的唯一生活，正像她所提过的，是“文明的”，也就是居住在城市里。所有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字眼都是源于这一点。“政治”（politics）与“政体”（polity）的字源是希腊字“城邦”（polis）；同样，“市民的”（civil）、“礼貌”（civility）与“文明”（civilization）则都来自拉丁字“市民”（civitas）。随着时间演变，这些词也都变成了抽象名词，可译为“国家”（the state）或“全体国民”（the commonwealth）。但其实这两个词原来描述的都是古代世界自给自足的城市空间。罗马是“永恒之城”，是“众城之王”，14世纪诗人克劳迪安描述它为“武器之母，让帝国凌驾一切”<sup>[1]</sup>。因此，帝国的根基与城市的创建总有着紧密的关系。亚历山大大帝（我们将会再度谈到他）以他的名字命名了数十个城市：在埃及的亚力山大（这些城市中最大的一个，也是至今唯一一个被称为“亚历山大里亚”的城市）、在伊朗中部的赫拉特、在阿拉科西亚（可能是现今的坎达哈）、在兴都库什山脉的贝格拉姆、在艾斯恰特（现今的列宁纳巴德）。单单在公元前328年这一年，亚历山大就在乌浒河北岸创建了6个新城市。根据罗马哲学家、历史学家普鲁塔克的说法（虽然他有所夸大），亚历山大大帝在他统治期间，创造了至少70个新定居点。几个世纪之后，当西班牙的征服者埃尔南·科尔特斯在1519年至1519年间行过墨西哥时，也在途中创建城市，首先在维拉克路兹的海岸旁，接着在乔鲁拉与特拉克斯卡拉。最后，当他于1521年攻陷阿兹特克首都特那屈特兰的时候，他重建了这座城市并将其改名为墨西哥城。

当然，城市绝对不是欧洲的特有产物。就像其他很多被定义为欧洲文化的事物一样，城墙高筑且大部分采取自治的城邦区域源于亚洲。但只有在公元前6世纪之后雅典兴起时，在欧洲人的政治想象画面中，才开始把一种城市氛围与某种特殊的生活方式整合在一起。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人是“政治的动物”（zoon politikon），单从字面意义来解释，意思是说：人是一种“在城邦里生活”的动物。在希腊世界中，城邦生活

不仅是可以得到的最好的生存方式，而且对人类来说，也可能是获取大自然或诸神为生命所设立的终极目的的唯一方式。那么，亚里士多德会认为，在城市的范围之外，除了“野兽和神祇”以外不存在任何生命，也就不足为怪了。几个世纪以来，那些自己选择或被迫离开他们的本土城市的人，一直都被鄙视为堕落或危险的潜在群体。在古代时期，被驱逐流放是一项堪比死刑的惩罚；而在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准确地说，它常常被描述为“褫夺公权”。

那些选择生活在城市之外的人，以及旅行者、漂泊者，甚至是新移民，在欧洲历史进程中长期普遍遭受迫害与虐待。最极端的例子就是欧洲的吉普赛人。吉普赛人的历史，由最初被认为是奥斯曼土耳其征服拜占庭帝国的牺牲品，而令人震惊和同情，到成为受人怀疑的对象，最后则因为希特勒的帝国企图灭绝他们而成为毒气室里的受害者。

然而，尽管对旅程充满怀疑，以及漂泊转移、无家可归的恐惧，但大多数人仍然曾被圣弗朗西斯描述为“长年不断的游走者”。当博尔赫斯的祖母遇见那位年轻的英国女士的时候，当时她自己也是生活在 19 世纪阿根廷的新开拓区，那儿的生活环境并没有比她憎恶的印第安人的环境先进多少。我们大多数人都免不了要迁移。即使实行同族通婚最彻底的群体，为了生存起见，偶尔也会允许其成员“对外联姻”。因此，即使很关注定居可能带来的种种美德，所有的文化如果想求进步，他们也仍然不得不向外移居。几乎没有民族会将永久安居不动的状态视为正常。快乐的玻利尼西亚人——那些“高贵的野人”——他们以迥异特出的形象出现在 18 世纪的法国文学的想象性作品中，他们哪儿都不去，并且命令所有那些前来造访的欧洲人立刻回去。正如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曾经所说的，这些玻利尼西亚人“根本就不能对他们为什么应该存在这样的问题，给予令人满意的答案”。康德的用词之所以没有太尖锐，与其说是因为塔希提人本身

就没有远行的欲望，不如说是他对“纯粹”享乐的生活方式这种说法感到质疑<sup>[2]</sup>。但是，他也的确看出塔希提人的“社会理想”中的某不人道之处，这是对的。

就像康德所坚称的，人类历史的终极目的就是以安居、秩序、和平与法治为历史。但它开始于迁移、不安、追索新资源、寻求更宜居的气候，以及对财富永不满足等的过程。这些动机驱使原始人类迈出非洲，跨越全世界，并且也同样促使他们的后代直至今日。可能全世界所有民族的所有文化，都曾是长期迁移过程中的产物。因此，大多数我们所要诉说的有关自己过去以及未来的故事，都是一篇篇的旅途行传。

有这样一篇故事，是很多欧洲人叙述人类起源的典型故事，它收录在公元3世纪的一本奇特的文集中，因被称为《赫姆提卡文集》而有名。该

#### ▼ 图 2

罗马斗兽场是罗马帝国时代最大的圆形剧场，也是帝国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大约建于公元1世纪70年代，最初可容纳7万名观众。此为罗马斗兽场的全景照片。



书被认为是赫尔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埃及智慧之神透特的希腊语名）的著作，他的智慧甚至被认为先于摩西。该故事说道，希腊神祇赫尔墨斯的工作是监禁造物诸神——即那些在创造宇宙时提供帮助的神祇，由于他们企图对抗众天神的创造力，而被处罚居于人的肉体当中。甚至是在赫尔墨斯正工作的时候，嘲弄之神（摩摩斯）便前来恭维他。他嘲笑说：

创造人类是件多么英勇的事啊，这个有着好奇的眼睛和夸夸其谈的嘴巴的生命啊……他会将自己所谋划的想法甚至推到地球之巅。〔这些人类〕将会把他们那双无畏而忙碌的手，伸向天涯海角。他们将会砍伐丛林，将它们〔也就是做成船只〕从此岸驶向彼岸，用尽所有方法抵达最遥远的陆地<sup>[3]</sup>。

这些新孕育出的且非常麻烦的造物神们，他们在游历之际，聚在一起组成家庭，并进而形成部落，他们说着彼此独立的语言，追求着独立的生活方式。这就是民族的起源。一旦分散，强者就开始掠夺弱者。这就是帝国的起源。

\* \* \*

但帝国究竟是什么？马其顿、罗马、拜占庭、奥斯曼土耳其、中国、秘鲁与墨西哥、苏联、美国，甚至是美国的对头——欧盟，所有这些都一直被称为“帝国”。我们会谈到“非正式的”、“经济的”帝国，谈到“贸易”帝国，甚至是精神帝国或理性帝国。“帝国”已经成为一种比喻，而不仅是对某一特殊类型社会的描述。今天，这个词已经被普遍滥用，尽管很多时候会带着怀旧情绪来提到它。“帝国”一词，或者是表明技术先进

的民族，因其力量对大多数防御能力差、技术单一的民族施行无情的驱使与剥削，这种类型的帝国在欧洲连续的武力之下，首先是在美洲打上烙印，继而在亚洲，最后在澳大利亚及太平洋诸岛；或者是让人将它与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或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的形象挂钩，在这些国家，压迫者与被压迫者都处在共同的文化类型之下，并在很大程度上有着相同的技术。在这两种情况之中，“帝国”都代表着一种政治模式，即对一个民族的权力的否定，在难以计数的权利当中，最为首要的是否定其他民族的自主权。

人们会觉得，帝国在某种意义上是人为产生的。可以通过征服而缔造帝国，但征服者常常会试图使被征服者安于顺从。这种情况往往是通过诉诸单纯的武力与某种意识形态的结合而达成。就罗马帝国来说，它的意识形态就是“文明化”的那一套，即一种更令人满意、更舒适并且是无限富足的生活诱惑。而在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等帝国中，也采取了同样的意识形态，但同时受到基督教的不同分支所强化。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则采用伊斯兰文化，正如在苏联，是采用马克思主义。一般也认为，这些生活在帝国统治下的所有人群，终究不会愿意维持现状，他们迟早会起而反抗，驱逐那些征服者。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大部分帝国不可否认是如此，但绝非全都这样。对世界上大多数民族而言，帝国已经成为征服者或被征服者的一种生活方式了；而我们所称的帝国，其内容不仅因时因地而有极大的差异，也标志着所涉及的人们过着彻底不同的生活方式<sup>[4]</sup>。

“帝国”（empire）这个现代词汇与其变体“皇帝”（emperor）、“帝国主义”（imperialism）等词，在很大意义上源自这个拉丁词“imperium”，该词在古罗马帝国时期，指的是至高无上的权力，包括战争指挥权和行政官的法律执行权在内。所以，该词将欧洲帝国主义的历史与罗马帝国的传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本源上说，“帝国”这个词原本指的不过是“统治权”，这一内涵至少保留至18世纪。但其实自罗马共和时期开始，它就

已经成为用来描述拥有辽阔疆域的政府的一个词。例如，早在公元 1 世纪初期的历史学家塔西陀，就已经用“巨大的帝国实体”来谈论罗马世界，他口中的“巨大”便暗示出帝国的统治延伸到它的每一寸领土；然而这样规模的领土最终不过分裂成王国和公国<sup>[5]</sup>。1914 年，挪威的极地探险家南森计算出，俄罗斯帝国在四个多世纪中，以每天平均约 55 平方英里，也就是每年超过 2 万平方英里（大约相当于现今比利时的领土面积）的速度在迅速扩张。从领土来看，俄国当然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虽然大部分领土没人居住。但对其他的大多数帝国人民而言，想到帝国总是会想到类似这一类型的数据。在腓力二世——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统治之下，他将马其顿王国扩张到爱琴海与黑海的沿岸。而到了公元前 323 年亚历山大大帝去世时，这个帝国的领土已从亚得里亚海远至印度，从旁遮普远至苏丹。在 1400 年，帖木儿帝国（如克里斯托弗·马洛的《帖木儿大帝》所说）的领土，从黑海一直延伸到喀什噶尔的城门。13 世纪时，奥斯曼苏丹王朝的领土还只是神圣（ghazi）战士所拥有的小小的安纳托利亚行省，夹在拜占庭帝国与塞尔柱土耳其之间，但到了 16 世纪初期，它已经从匈牙利绵延至中亚，扩张超过了 6000 英里。印加帝国的领土在 15 世纪初期原本一直局限在库斯科区域周围，1532 年，当西班牙征服者皮萨罗的军队到达秘鲁时，它随即向北延伸至今天的秘鲁、厄瓜多尔与哥伦比亚，向南则扩张到玻利维亚、智利北部与阿根廷西北部。

由于帝国幅员辽阔且不断扩张，所以往往囊括了有着多种多样习俗和信仰的民族，并且常常是操着多种多样、彼此不同的语言。这种丰富的多样性如同其领土般辽阔，它们共同让帝国建立起自身的身份认同与荣耀。公元前 2 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阿曾经说过，罗马人的伟大来自于他们能统治着亚历山大大帝从未听过的民族。1600 年后，查理五世治下的西班牙历史学家们，也对他们的皇帝做了同样的观察与结论。

由于面积广大与绝对的多样性，大部分的帝国都立即成为世界性的国

家。为了统治辽阔而分隔的领土，帝国政府通常会发现，他们不得不非常容忍各地文化、有时甚至是信仰的差异，只要它们不对当权者构成威胁。在极其广大的社会里，最高君主到底是在伦敦的国王还是在德里的皇帝，人们对此很漠然是常有的事情。在许多情况下，人们更倾向于被一个遥远的政权统治，而非一个近在咫尺的政权。16世纪时，深陷于西班牙与法国势力之争的米兰人就曾说过，马德里的国王比巴黎的国王要好，至少马德里比巴黎更遥远。

然而，如果帝国能够普遍地忍受境内的多样性，就会不可避免地改变它治下所聚拢的民族。1797年，拿破仑的外交官塔里兰就曾说，“帝国”是“安置人民的艺术”。而安置人民必然会导致漫长而广泛的迁移。当中有一些人是心甘情愿的，如那些无依无靠者的流浪，或是像发生在美洲、亚洲与后来非洲的迁徙，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人们为了追求更美好、更富足的生活而移居。但有些完全是非自愿的，例如大西洋的奴隶贸易——数量最多且最为臭名昭著——或是1840年代受契约束缚的印第安奴仆，英国人将他们载到索尔兹伯里爵士称之为“较温暖的”英国属地，这些奴仆涉及毛里求斯、特立尼达、斐济与纳塔尔等多个国家<sup>[6]</sup>。

所有从欧洲到美洲方向的迁移，都已无可避免地破坏了当地此前繁荣的社会。但这些人口也带来之前从未存在的社会形态，并随之缔造新的民族。希腊与巴尔干半岛的现代居民，就不完全是亚历山大统治下的后代，现代的意大利人也不完全是古罗马人的后代，而美国的黑人与曾生育过他们的西非民族也大不相同。绝大多数的西班牙裔美洲居民，既不算完全的欧洲人，也不是纯粹的印第安人，套用“解放者”玻利瓦尔将军在1810年说的话，他们是“这块土地的合法拥有者与西班牙篡夺者之间的‘中间种族’”。

帝国严格限制了某些民族的自由，但同时也给予这些民族可能没有想象到的机遇。正如现代印度之父尼赫鲁曾经观察说道：“外来政权即使罪恶满盈，至少有一项优点：那就是扩大了人们的精神视野，迫使他们从封



▲ 图 3

百慕大群岛上的圣乔治镇。该殖民地的建立是起源于 1609 年维珍尼亚公司的旗舰在百慕大附近海域的失事。维珍尼亚公司的宪章遂增订有关条文声称拥有百慕大，而从那时起该殖民地就一直属于英国。自维珍尼亚州获得独立以来，百慕大就一直是现存最古老的英国殖民地，而圣乔治镇也成为英国在新大陆历史最悠久的定居点。

闭的壳中探头外看。他们会认识到这个世界比想象中的还要广阔，并且丰富多彩。<sup>[7]</sup>”就这方面而言，不论是实际上或象征上，帝国都因提升和传播人类知识而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就像 1620 年英国哲学家培根的深思所反映的，“遍及整个世界的迁移”，他的意思是，迁移所占领的陆地与海上航行一样，显然是“天意注定”要在“学识进步”的年代完成<sup>[8]</sup>。

当然，帝国也要为人类所遭受的苦难负起相当大的责任。它们要为美洲与太平洋上许多民族的集体消逝负起责任，并且它们或许已在地球表面的大片区域造成不可挽回的灾难。如今，帝国已经不再，至少传统形式的帝国是如此。但在过去好几个世纪中，它们确实构建了人类的历史。

## 注 释

- [1] Claudian, *De Consulatu Stilicbonis*, III .135—70.
- [2] Immanuel Kant, “Review of Herder’s Ideas on the Philosophy of the History of Mankind,” in *Political Writings*, ed Hans Reiss ( Cambridge, 1991 ), 220.
- [3] *Corpus Hermeticum*, eds. A. J. Festugieére and Arthur Darby Knock ( Paris, 1954 ), IV Fr. 23, 14—16.
- [4] 详见 Maurice Duverger, ed., *Le concept d’empire* ( Paris, 1980 )
- [5] J. S. Richardson, “Imperium Romanum: Empire and the Language of Power,”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81 ( 1991 ) : 1—9.
- [6] 详见 Hugh Tinker, *A New System of Slavery: The Export of Indian Labour Overseas 1830—1920* ( London, 1974 ).
- [7] Sunil Khilnani, *The Idea of India* ( New York, 1997 ), 118.
- [8] Francis Bacon, *Novum Organum*, in *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 eds. James Spedding, R. L. Ellis, and D. D Heath, 14 vols. ( London, 1857—74 ), 4:92.